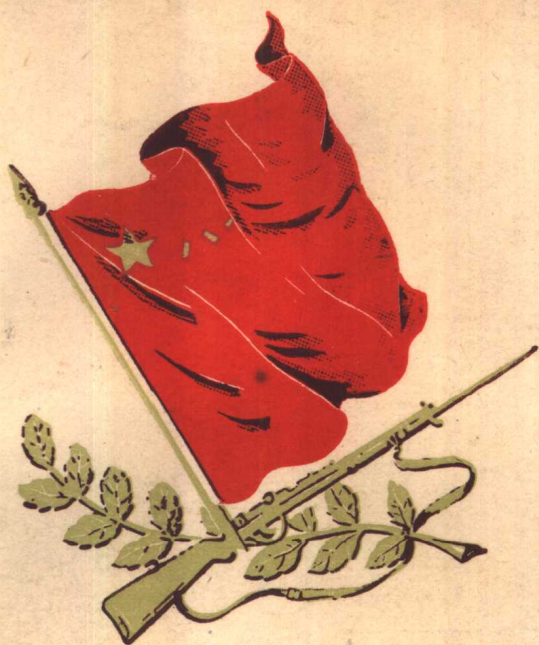




在紅旗下前進

閻紅彥等著

在紅旗下前進

閻紅彥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8年·成都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里選輯的十篇文章，都是從“草地”以“艱苦的歷程，英雄的诗篇”為題的征文中選出來的。這次征文是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周年而發起的。

這十篇文章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各個歷史時期的艱苦鬥爭，忠實記錄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經歷過的“艱苦的歷程”，寫下了許多革命先烈和人民英雄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文章都是作者根據他的親身經歷寫成的。里面有充沛的火一般的熱情，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這本書會給我們今天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人們莫大的鼓舞力量。正如一篇評論文章中所說的，讀了之後，會“覺得身上增加了無窮無盡的力量”。

其中閻紅彥同志的“陝甘早期革命軍事鬥爭的片斷回憶”比較詳細的介紹了陝甘早期革命軍事鬥爭的情況，是一份難得的、珍貴的史料。

在紅旗下前進

閻紅彥等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狀元街20號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重慶印制第一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46頁·2 1/8印張·60,000字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數38,001—48,000 定價：(6)2角4分

統一書號：10118·250

目 次

陝甘早期革命軍事斗争的片断回憶·····	閻紅彥 (1)
我所看見的淮海战役·····	明 朗 (21)
我們的旅部遭到了襲击·····	小 兵 (30)
夜襲陽明堡·····	余述生 (34)
紅軍在越巂·····	王海民 (41)
王生才同志·····	趙連城 (50)
同朱总司令談天·····	何从桥 (58)
涪江岸上·····	張國治 (61)
一張藍色的苏維埃票子·····	方振益 (70)
永恆的鞭策·····	楊田村 (81)

陝甘早期革命軍事斗争的片断回忆

閻紅彦

清 潤 起 义

1924年，陝北軍閥井岳秀部下有个連長，名叫石謙，因为他是个拐子，人們都叫他“石拐子”。他升了营長以后，共產黨員謝子長同志和李象九同志利用和他同鄉关系，就在他的部隊里先后成立了两个連隊，这两个連都是招收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我当时就在李象九連里。

我們每人一杆陝北造的步槍，每天清早上兩個鐘头軍事操，接着要上七堂課。謝子長、李象九从北京、陝西的榆林中学和綏德第四师范請來一些進步教員，給我們講“勞農政府”、“馬克思主义淺說”“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宣言”一类东西，教我們学“平民千字課”和算術。連里还訂了“中國青年”“向導”等雜誌。共產黨員李子洲、魏野疇、楊明軒等同志也經常來講演，宣傳革命。我們的連長李象九从來不穿軍衣，愛穿一身朴素便衣；他常給我們講水滸，灌輸打富濟貧的思想，講得有声有色，听得你眉飛色舞。在共產黨宣傳的影响下，石謙也表示贊助革命，我記得他講过：“誰不革命，就不是娘老子养的。”

謝子長和李象九在部隊中秘密建立共產黨支部。這兩個連中很多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我也在1925年入了黨。我們連的黨支部書記是史唯然同志。

我們連隊里的生活很活躍。士兵們組織了自治會。自治會領導士兵自己縫衣做鞋，學唱歌、演新戲、踢足球；我們最喜歡唱“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每到傍晚休息的時候，連隊里的歌聲就響起來了。連里提倡艱苦朴素作風，禁止官兵抽煙喝酒。

謝子長、李象九領導的連隊，住過安定（現改為子長縣）、宜川、清澗等縣。紀律很好，不動老百姓一針一線。軍民關係很融洽，我們連的牲口常常馱着足球和油印機，路過當地小學，就把這些東西送給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聯合當地的學生，派出講演團或宣傳隊，向羣眾宣傳識字、禁煙、放腳、反對土豪劣紳、反對高利貸、不准官方放賭、禁止軍隊拉差。

1925年到1927年期間，石謙當了團長；在團改編為旅時又當了旅長，李象九也升做營長。大革命對這個部隊發生了很大影響。黨從毛澤東同志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和黃埔軍校派來了一些黨員；從黃埔軍校來的閻揆要同志，在石謙旅里建立了教導隊。這時，部隊的黨組織更壯大了，這個旅有五、六個連長和一、兩百個士兵都入了黨。謝子長、李象九的部隊每到一個地方，就幫助當地羣眾組織農民協會。謝子長同志還在安定縣開辦農民講習所，培養出一批幹部，吸收了一批農民入黨。

當時，陝北的土豪劣紳勾結軍閥、官僚，利用軍隊、衙門、民團這一套工具來壓榨勞動人民；老百姓受盡他們的欺

侮、剝削，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被拷打、監禁，冤枉遭殺害的不知有多少。地粮捐、烟畝捐（即种鴉片烟稅）等数不清的苛捐雜稅和奇重的地租、高利貸剝削，压得農民过着“餓不死、活不成”的痛苦生活。遇到歉收年，農民就吃樹皮草根，賣兒賣女过活。当地羣众非常痛恨軍閥官僚和豪紳地主。在全國大革命的高潮影响下，羣众的革命热情很高。我們去組織他們進行反对豪紳地主的斗争，他們都踴躍参加。在这个期間，謝子長同志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領導安定縣的農民协会，拘禁和審判了人人痛恨的豪紳宋运昌、李耀輝、王伯揚，使人心大快。后來，井岳秀派來的提款委員、收烟款委員，也都因为謝子長同志領導農民進行抗款斗争，給碰回去了。周圍的羣众很佩服謝子長同志，認為只有他才敢領導大家这样大胆地整豪紳，所以称他是“謝青天”。

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失敗以后，武漢、長沙、西安等地反动势力極力向革命進攻。駐防陝北榆林的軍閥井岳秀也开始向革命進攻。他乘石謙到榆林去給他拜寿的时候，要石謙把謝子長、李象九交給他，想要扑滅这支受过革命訓練、开始和羣众有了联系的武裝力量。石謙受了大革命的影响，又因和李象九是同鄉，不願意交出謝子長、李象九。井岳秀终于在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不久，暗殺了石謙。

在石謙被殺以前，中共陝西省委就秘密派了由党中央調來任軍委工作的唐澍同志到我們部隊里來，大家都称他是唐先生。他一到部隊，就整天开会練兵。他很会講話，給部隊講当时的革命形势，講蔣介石、汪精衛等叛变革命，大家听了都恨

死蔣介石這幫子人。當我們聽到南昌八一起義消息的時候，受了很大鼓舞，都認為起義是對付反革命的好辦法。

緊接着，我們部隊控制的其他幾個縣，經常有人來清澗聯繫、送信。不是部隊上的，就是地方黨的，空氣十分緊張，雖然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已經覺察到快要出什麼事了。這時又傳來石謙旅長被殺的消息，整個部隊都很憤怒、很激動。有一天，李象九告訴我說，我們要起義了；到底怎樣起義，我還是弄不清楚。又有一天晚上，我們部隊秘密地把所有黨員都叫去開會。我記得會上大意是說，省委有指示，要打倒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在“為石旅長報仇”的口號下舉行武裝起義，並且對起義作了具體布置，決定在第二天動手。大概是興奮的緣故吧，這一天晚上，我好象沒有好好睡過，在前一個時期學了些革命的道理，眼看着就要干起來了，這對我們年青人來說特別感到興奮。第二天是10月12日，各地地方黨派來的學生、教員等參加起義的人都領了槍、彈，整天都在做緊張的准备工作。那個白天好象分外的長，好容易等到快要天黑，李象九集合全體部隊講話，宣布起義，每個人臂上都綁上紅布，把準備好的標語到處張貼起來；一部分人分頭去抓土豪，給我的任務是去抓縣長，盼望了好久的起義就這樣開始了。我們抓住了縣長，打了几十家土豪劣紳，可就是沒有發動羣眾去懲治人人痛恨的大土豪。鬧了一整夜，第二天就从清澗出發，經過延川、延長（這兩個縣都駐的我們的人），占領了宜川。在延長，把原來石謙旅的反動的二營營長祁梅卿槍斃了，把他的——個反動連繳了械。沿路許多地方黨組織發動黨員和進步青年知識分子

參加進我們隊伍里來，他們的情緒也非常熱烈。這樣大斗大鬧，接連有五、六天沒有機會好好睡覺，可是誰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危險、疲勞，只感覺到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頭有說不出的高興和痛快。

在宜川，隊伍改編為四個營，推舉李象九做旅長，唐澍當了參謀長，謝子長當了營長。這個武裝雖然基本上是黨領導的，但是成分極為複雜，有很多舊軍官和兵痞，參加起義的動機各有不同，來不及加以整訓，領導上也沒有重視首先整頓部隊內部。當時也不懂得發動羣眾，靠近山地開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聽說井岳秀派兵來打，起先想堅守宜川，打硬仗，後來當敵人四面集中準備圍攻時，又倉促決定突圍。由謝子長同志帶領一個營在前頭打，已經突破了缺口，占領了敵人一部分陣地，可是後面牲口、家眷一大堆，沒出城先就亂成一團，你擠我爭，全都亂了；有一部分就跑散了，只有謝子長同志帶領的第一營和其他各部中的幾百青年突圍出來，退到了宜川西面的大南川。

在1927年年底，我們在韓城附近正式成立了西北工農革命軍；唐澍當總指揮，謝子長當副總指揮。由於對敵我力量估計不足，又決定攻打宜川，結果遭受了很大損失，最後不得不往北退走，敵人緊緊追趕。我們的子彈都打光了，子彈袋都成了空囊子。天擦黑剛想休息一下，敵人又來了。我們為了保存人和槍，只好暫時分散隱蔽。後來謝子長和唐澍兩同志決定化裝去西安找陝西省委。臨走時，他們給我們說了很多勉勵的話，有的同志因為舍不得他們走，當場就哭了。

这次起义固然失败了，但是，从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批坚持陕北革命斗争的青年干部，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和西渡黄河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的结果，山西军阀阎锡山倒了台，山西局面很混乱。群众遭受战争的痛苦，对阎锡山的反动统治极为痛恨；就在那年冬天，我和白锡龄同志被派到了山西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同志指示我们利用驻在汾阳县的冯玉祥的教导团里党的关系，在晋西一带建立游击队，并且从太原兵工厂调了些工人，又从旧军队高桂滋部中调了吴岱峰等十几个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1931年春天，我们进入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在汾阳、孝义、中阳、离石一带活动。汾阳永安镇驻着敌人的一个排，这个排中有我们党的关系，经过党的关系，在内部发动兵变，把队伍拖到了我们游击队方面来。我们的队伍扩大了。

到夏天，在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里，我们就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一次在吕梁山上高高举起了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大家推举杨重远、吴岱峰和我担任大队副和大队长，黄志文同志担任政委，白锡龄等同志担任中队长，在这一带山里打游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这时，商震当山西省政府主席，正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顾不上来围攻我们，经常和我们周旋的只是一个排、一个连，最多一个营；我们对敌人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转移。记得有一

次在石樓縣水頭鎮，敵人一個連想包圍我們，結果，反而被我們消滅了。我們一面打游擊，一面到處張貼標語，進行宣傳，發動羣眾開會打土豪，進行分糧、抗款的鬥爭。我們很快得到了廣大羣眾的擁護，無論走到哪里，都有羣眾給我們送飯、送情報，聲勢挺大；太原的報紙天天登載我們游擊隊的消息。有一次，我到太原向省委請示工作。那時，商震跑到了石家莊，徐永昌準備上台當省主席，正在太原城內海子邊召開討伐商震的大會，我也溜進了會場。會上宣布了商震的十大罪狀，其中有一條罪狀，就是說晉西游擊隊到處活動，商震拿它沒辦法。我聽了，心里忍不住好笑。當時山西省委已經看到了山西局勢的變化，估計到徐永昌上台後，會加緊對游擊隊圍攻；要是敵人派大軍圍攻，游擊隊可能在山西站不住腳，因此指示我們必要時過河西去打游擊。

我回到游擊隊不久，果然，徐永昌就派了一個師和一個炮兵團，大約有一萬多人的大軍來“圍剿”游擊隊了。敵人倚仗人多勢眾，每攻占我們一個村子、一個鎮子，就駐扎上一個連，修筑碉堡，死守起來。時間一久，敵人鋪的面越來越寬，我們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了。最後我們已經不能到村里去活動，只在山上打轉轉，靠羣眾秘密地給我們送點吃的東西。這時山西省委和整個山西黨又遭到了大破壞，晉西農村黨的工作基礎又較差，在敵人大舉進攻的情況下，繼續在晉西活動有很大的困難。而黃河西面的陝北地區軍閥井岳秀統治比較薄弱，黨的工作在農村中和學校中有基礎，和羣眾有密切聯系的、為我們所敬愛的謝子長同志和劉志丹同志也在那里活動，條件要

好得多。根据山西省委原先的指示，部隊准备西渡黄河。但是过河也有許多困难，黄河兩岸都有敌人嚴密封鎖，船只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就全部集中控制起来，不准擺渡。我們能否过得去，是个大問題。同时我們和河西的党組織事先沒有联系，过河后会遇到什么情况，心里也沒有底。因此，游击隊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主張不过河，留在晉西坚持斗争，和敌人干到底；有人主張把槍埋了，分散回家，待机再起。經過反复的爭辯，最后还是决定过河，到陕北去和謝子長、刘志丹同志会合。

过黄河是肯定了，但周圍和沿河兩岸的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渡河呢？怎样过呢？这可又把入难住了。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汾陽和中陽交界的山上向西移动，發現山谷里有个看西瓜的棚子点着灯，楊重远同志下去一看，棚子里有个看守西瓜的老漢。那老漢听說是游击隊，就高兴的說：“我認得游击隊，你們都是好人，你們还給我分过粮食哩！”他給楊重远同志說了周圍的情况，楊重远同志問他可知道去河边的小路，那老漢挺爽快，他說他到黄河边上收过木耳，認得路，願意帶我們去。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連星星都沒有一顆。我們每人背了兩支槍，跟着帶路的老漢爬山过嶺，走的都是羊腸小路，到第二天下午赶到了辛关附近的河边，一共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沒有停下來歇过脚，好些同志倒下去就呼呼地睡着了。我心里想，今晚过了黄河，一定叫大家認真睡个觉。老漢先把我們安頓在一个破庙子里，很快又把他的一个親戚找来，一同商量渡河的事。老漢的親戚來了，說他不会水，附近有个

王怀安是搞船的，把他找来商量吧。王怀安有三、四十岁，是陕北清涧人，他来了，我们要求他赶快搞船把我们渡过去。他说下面是辛关，辛关对岸是河口，扎着敌人，又没有船，当天夜里不行。我们都很着急，怕到了白天，会被敌人发觉，再三找他想个办法。他建议我们移动一个地方，我们同意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窠子里，给我们弄来了一些稀饭和饼子。要等到第二天的晚上，还有一天一晚的时间，本来这一天一晚对我们是极宝贵的，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谁也睡不着，都爬起来研究过河的办法。我们都不会水，只有白锡龄同志会水，他身体挺棒，大家都叫他“老牛”。有的开玩笑说：“我不会水，老牛把我驮过河去吧！”第二天晚上，王怀安绑好了几个羊皮筏子，又带来了几个水手，找了个没有敌人的地方让我们渡河。羊皮筏子是很别致的，把没有剖开的整只羊的皮抹上桐油，两头扎住，中间吹上气，七、八个羊皮用四根棍子扎起来，就扎成一个筏子。当地人称它为“潭脱”。一个筏子一次只能载几个人，而且要两个能浮水的人脱去衣服推上走。那时正是秋天，夜晚的河水，冰冷刺骨，水流又急，浪头又高，人坐在筏子上，就等于坐在水里一样，只是不沉下去就是了。为了御冷，我们每人喝了一些酒，身上也抹了酒。白锡龄同志、王怀安和水手们一齐脱光衣服，在冰冷而又湍急的河水里，一面浮水，一面用力推着筏子走，他们的艰险和辛苦是难以形容的。他们不停歇地来来回回地渡，终于把我们全部渡过了河。1942年，我在延安意外地碰到了王怀安，觉得特别亲切，相互问了分别后的情况，那时我拿不出什么礼物送给他，

只請他吃了一頓飯。我深切感到我們干革命的人，要是離開了羣眾，真是寸步難行。直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王懷安和那帶路老漢的相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

南 梁 會 合

過河以後，羣眾開始還不知道我們是游擊隊，都跑了。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吃了羣眾的東西，都把鍋碗洗得干干淨淨，留下錢和條子，說我們是游擊隊。中共陝北特委很快知道了我們，派人來和我們聯繫，派了一批黨員到我們游擊隊里來。羣眾知道我們是游擊隊後，對我們很熱情，我們真好象回到了老家一樣。我們就在延川、安定、安塞、保安（現為志丹縣）幾縣來回打游擊。我們扎在瓦窯堡附近的時候，地方黨的同志給我們送來情報，說玉家灣住着敵人的一個騎兵排，誰家家里住幾個敵人，都說得清清楚楚。我們就在拂曉時分，乘敵人沒有防備，給了它一個突然襲擊，消滅了全部敵人，繳了幾十支槍和許多馬匹、子彈。羣眾又要求我們打瓦窯堡，因為那里的敵人糟害老百姓特別厲害，老百姓恨死他們；他們對我們說：你們打不開，我們拿鋤頭、鐮頭，也要把瓦窯堡刨開。我們接受了羣眾的要求，去打瓦窯堡，許多老百姓都站在附近山頭上吶喊助威。我們一度打進了城關，因為我們路過吳家寨時，正遇見吳岱峰同志的兄弟娶親，吳老太太攔住不讓走，再三留部隊吃油糕，耽擱了時間，敵人有了準備，結果沒有打下來。在這段時間，我們的游擊隊的人員、槍支都擴大了，單說山西造的沖鋒機槍，就是四十多支。到處都有地方黨領導的羣眾配合我們的

行动，声势很浩大。

我們經過安塞、保安的时候，沿途打听謝子長同志和刘志丹同志；他們是陝北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1924年起，他們就在陝北進行革命活动，謝子長同志領導过清澗起义，又和刘志丹同志一同参加領導过1928年4月举行的渭華起义。這兩次起义的失敗，使他們体验到要和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必須依靠農村進行游击战争，特別是毛澤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南方領導農民开展游击战争的經驗，給他們很大啓發和教育。那时候起，他們就在陝、甘交界一帶發動游击战争。他們利用軍隊中的关系，先后打進軍閥隊伍，爭取羣众，建立党的秘密組織。为了搞革命武裝，刘志丹同志在邠縣被反动派逮捕，关入牢獄，幸好得到杜斌承先生的援救，才免于死。1931年秋天，刘志丹同志利用甘肅軍閥陈國璋的名义，在寧縣成立了一个旅，当地許多農民和共產黨員都参加了他的部隊；可惜后来被陈國璋部打散了。以后，刘志丹同志在保安縣的南梁一帶結合旧部成立游击隊，繼續進行活动。

1931年9月間，在南梁附近的林錦庙，我們和刘志丹同志領導的游击隊会合在一起了，举行了勝利会合的联欢会，士兵們唱呀笑呀，說不尽的喜欢。当地一位老漢領上自己的两个兒子，敲打着小鑼小鼓，給我們表演小唱，今天想起來，印象还非常鮮明。

在这以前，我曾經和刘志丹同志在一起搞过游击隊。这次見了他，感到分外的高兴。他穿的依然是很破旧的衣服，头上包着羊肚子毛巾。他很关怀地問我在山西打游击的情形，我也

問他在陝北進行革命活動的情形，我把我最心愛的一支匣子槍送給他，當作見面禮物。

刘志丹同志，讀過中學，上過黃埔軍官學校，是我們中間最有學問的人，對這一帶地形非常熟悉，在這裡打游擊，他就是好向导，不管白天黑夜閉着眼睛都不會走錯，人們稱他是“活地圖”。在這一帶到處都是他的家，不管大人、小孩都知道他，並且親切地叫他“老劉”。黑夜里游擊隊去敲老百姓的門，只要一說是“老劉”的隊伍，老百姓馬上起來請他們進去，騰出窯洞來讓他們休息。

我們會合以後，刘志丹同志很快又号召一批人參加部隊。接着，謝子長同志和中共陝西省委的幾個同志也來了。游擊隊有了陝西省委的指示，有了謝子長、刘志丹兩同志的領導，大家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部隊很快開到甘肅省慶陽縣的新堡鎮一帶。在那里休整一个多月後，甘肅軍閥陳國璋在我們四周布置軍隊，我們看到苗頭不對，知道敵人企圖打我們的埋伏，在一個早晨，我們先發制人，把敵人預伏的兩個連，統統給消滅了。部隊離開慶陽，浩浩蕩蕩沿着子午嶺，到了正寧縣的柴橋村。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以後不久，部隊按照陝西省委的指示改編成反帝同盟軍，由謝子長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分別擔任總指揮和副總指揮。

陝甘高原舉起紅旗

反帝同盟軍成立後，部隊迅速擴大起來。陝西省委派來很多幹部，整訓部隊，大大提高了部隊的質量。1932年2月，反

帝同盟軍改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成立那天，正寧縣三甲塬的細嘴子廣場上扎着一座高高的台子，台子的上端高挂着一溜大字：“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授旗典禮大會”。台子兩旁插着鮮麗的鑲刀斧頭的紅旗，每個小隊前面都打着紅旗，所有武裝戰士的脖子上、騎兵的馬頭上或脖子上都拴着紅帶子，士兵的刺刀和赤衛隊的紅纓槍放着光，看起來非常整齊威武。正寧、枸邑的農民羣眾成羣結隊，從四面八方集攏來，有的抬着豬、羊，有的吹着噴吶，有的送紅旗前來慶賀。那天，陝西省委代表榮至卿、枸邑縣委負責同志第五伯昌、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都在會上講了話。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會開幕時的授旗儀式：枸邑縣委第五伯昌同志代表當地黨和羣眾，把一面寫着“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大紅旗授給了游擊隊的總指揮謝子長同志。在戰士和羣眾的激昂的歡呼 and 鼓掌聲中，我感覺自己的眼睛都潤濕了。好幾年來，黨一再指示必須在陝、甘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裝。為了這，有多少同志流出了鮮血，以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現在想望了好幾年的紅色軍隊，終於在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了，在陝甘高原上第一次高舉起了工農革命的旗幟，這怎么能不叫人感動呢！

紅軍游擊隊的生活是挺有趣的。指揮員們天天和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哪個戰士叫什么名字，有什麼脾性，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到宿營地，指揮員就到各個窯洞里去看戰士，關心地問問這問問那。謝子長同志和劉志丹同志年歲較長，對外大家叫他們總指揮，平常總是親切地叫他們“老漢”或“老謝”、“老劉”。謝子長同志有時口袋里裝些炒熟的豆子，到戰士們